

相比,研究仍显薄弱,与边郡在秦汉国家结构中的地位不相称,笔者以为今后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秦汉边郡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首先是时间上的不均衡,明显地重两汉而轻秦;其次是地域上的不均衡,表现出明显的重西北轻其他地域的倾向;再次是专题上的不均衡,尤以边郡屯戍方面的论著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关屯戍的论著 28 篇(部),这还不包括关于西域屯戍的论著在内,此外,军事防御 27 篇(部)、历史地理 25 篇(部)、边郡职官 21 篇(部),而对于其他专题如文书与边郡的行政运作、边防政策、边郡守尉政治实践对边郡形势的影响方面关注度明显不够。

第二,长期以来,大多学者将边郡作为一个习称使用,而对于边郡概念的含义、边郡概念的形成过程、边郡与内郡的分野、不同时期边郡的范围等尚缺乏深入的辨析。由于边郡的概念和范围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就无法以秦汉边郡为整体研究对象,对边郡的区域化差异以及边郡职官设置、迁转、任职时间与内郡的差异做系统性的研究。

第三,在探讨边郡的制度时,就制度谈制度的文章较多,对边郡特殊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对制度客体的影响,制度变化与边防政策和政局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边郡的范围表现出一种动态的结构,体现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往对边郡的设置、废弃、侨置与重建大多停留在历史地理层面的研究,着重探讨边郡的边界的变化、郡县的省并,而对于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边郡范围变化与政局关系方面还不够深入。

## 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综述与理论思考

朱智武

(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1)

作为出土文物资料,中国古代墓志既是彼时历史的实物见证,又是传世文献资料的补充,历来受到相关领域文史研究者的重视。就其整理与研究来说,前人多注目于出土数量甚多的北朝墓志及隋唐以降的历代墓志,而东晋南朝墓志由于历代出土较少,学界对其研究不多。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内考古发掘工作的新进展,东晋南朝墓志屡有发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日趋深入。现将既往研究成果作概要总结,冀对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开展有所裨益。

### 一、学术史的总体回顾

东晋南朝墓志为晚清以前传统金石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真正意义上科学研究则是伴随现代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其学术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北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主要是传世文献的墓志著录及传统金石学对墓志的初步研究。

传世文献中,除相关史籍对东晋南朝墓志有所引录外,最早著录东晋南朝墓志的是《文选》、《文心雕龙·诔碑》、《艺文类聚》等文学作品集及类书,然皆为墓志志文的节录,并不完整,且无丝毫考证,还谈不上是研究(《文选》卷五十九“碑文下·墓志”著录“刘先生夫人墓志”,《文心雕龙·诔碑》篇主要论述“诔”与“碑”两种文体)。其后明王行《墓铭举例》、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等,然多着眼于隋唐以降成熟期墓志的文体,而少及东晋南朝墓志。

传统金石学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欧阳修所撰《集古录》10卷,其中卷4对刘宋宗愬母刘夫人、萧齐海陵王2方南朝墓志进行疏证,补益史传,可以说是研究东晋南朝墓志的始创之作。欧阳修之后,石刻文献开始为历代学者所重视,而作为石刻史料的重要种类,墓志自然是历代石刻文献要籍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传统上重视碑刻,加上历代出土墓志较少,搜集不力,金石类著作中墓志所占比例不大。自宋至晚清,著录东晋南朝墓志的金石文献主要有北宋陈思《宝刻丛编》,明陶宗仪《古刻丛钞》、《吴兴金石记》,清王昶《金石萃编》、方若《校碑随笔》、黄本骥《古志石华》等。上述金石著作对历代出土东晋南朝墓志不乏重复著录者,或仅有考证而无录文,或有录文而无考证,或兼有考证与录文,可相互补益,彼此对照。其他金石著作对东晋南朝墓志有所著录者,就笔者所见,大致不出上述诸书所录范围,考补、疏证也无超迈之处,故而从略。

民国至20世纪50年代,受出土墓志数量的限制,东晋南朝墓志研究处于低潮,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其中,仅1940年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90年影印)将历代金石学者著录的题跋集为索引,为检索前人对东晋南朝墓志著录、研究情况提供了极大便利。

深入爬梳上述著录东晋南朝墓志的文献后,不难发现,它们多着眼于对墓志的著录,或就墓志拓片做题跋,进行辨伪、疏证等初步研究,虽不乏涉及形制、尺寸、墓主、年代等相关问题的精彩论述,然多偏重于文字考释,即便有志证史、以志补史之论述,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題。受时代及出土墓志数量的限制,传统金石学关于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存在不足与局限非常明显。而传统金石学研究的这些缺憾,尚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因此,重新审视传统金石学关于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旧有成果,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第二个阶段是建国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建国以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加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东晋南朝墓志陆续出土。有关东晋南朝墓志的介绍与研究是该时期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

文物考古工作者是出土墓志的最早整理与研究者的工作不仅涉及墓志文字的校读、考释、出土情况介绍等,还从考古学出发,就墓志与墓葬的关系、墓志使用方式、墓葬年代判定、墓主定位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对诸如婚姻、郡望等其他相关问题进行探究。文物考古工作者辛勤耕耘所获的成果,为其他领域做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墓志内容异常丰富,涉及历史、地理、天文、书法等各个方面,仅从考古学的角度展开论述,很难谈得上全面。且多数发掘简报将墓志作为墓葬随葬品之一,仅作一般性介绍,或囿于单篇墓志的梳理、考证。加上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或多或少受自身专业知识的局限,研究往往不全面,甚至犯一些常识性错

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建国以后出土的这批墓志,随即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书法研究者们的重视。1964年谢鲲墓志、1965年王兴之夫妇墓志在南京出土,更是直接引发了书法界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大讨论。这场激烈的大讨论,持续时间前后将近20年,众多书法研究者从不同方面着手,积极参与。大讨论所获成果的优劣、多寡,姑且不论。仅就书法学者们从文学、史学、书体等不同角度,利用各自领域的相关知识,进行广泛研究,形成激烈的论辩氛围与局面言,无疑是可喜的,因此也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

总的来说,该时段东晋南朝墓志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书法探讨的层面,且受当时政治氛围及学术发展相对滞后的大环境的影响,研究还很浅显。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赵万里编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下文简称《集释》),可谓传统金石学关于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书广泛搜罗前贤的著录题跋、考疏补证,并附有较完善的墓志拓片。令人遗憾的是,彼时东晋南朝墓志出土仍旧有限,故《集释》所收主要是北朝地域出土墓志,于东晋南朝墓志著录较少。且从所收几方东晋南朝墓志来看,其研究一仍传统金石学之旧,虽于考证、补史方面颇多可取之处,然局限性也甚是明显,犹未脱离传统金石学者的窠臼。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1980年代初,随着思想大解放,学术研究脱离了“文革”的阴影,重新走上正常轨道,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就东晋南朝墓志研究来说,开始有学者关注墓志的综合研究,从各个角度展开了讨论。但由于出土墓志实物资料有限,多数论说仍比较笼统、浅显。9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全面展开,科学理论的飞速发展,加上东晋南朝墓志的更多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受到历史、考古、文学、文字学、书法等不同领域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展开不同层面的研究,使得汇集刊布东晋南朝墓志资料的论著相继问世,相关出土墓志研究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端。仅从研究领域上看,该时段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已突破此前或书法,或历史学,或考古学研究的单调局面,转而走向层次不同、角度各异的新方向,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盛况空前、百花齐放的景象。

## 二、国内主要研究成果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十余年间,学术界在汇集刊布历代墓志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陆续出版了大批历代的墓志图录、文字集录,在墓志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发表了数量颇丰的研究论文。国内学界关于东晋南朝墓志的既往研究,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考古发掘简报的介绍与初步研究。基本限于相关墓志的出土情况介绍、拓片或照片刊布、文字内容的释读以及所涉问题的初步讨论,虽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信息,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如释文错误、文献考补不够等,有待深入挖掘。

(二)相关墓志资料汇编。建国以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汇集、刊布历代墓志资料的工作及相关成果令人瞩目,主要或部分集录东晋南朝墓志的有以下3种:

(1)《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0卷、《补遗》1卷(科学出版社,1956年线装本),赵万里编著。该书收录了当时所见汉魏至隋墓志609通,均选用较好的拓本影印,并附有考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不过,该书收录东晋南朝墓志甚少,仅收南朝宋刘怀民墓志、齐

吕超墓志、梁程虔墓志等3方,首著序跋,介绍志石的形制、尺寸、字数、出土情况,并作简要疏证;然后广罗《梦碧移言》等金石著作所引诸家题跋考证,以资考补。

(2)《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下文简称《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赵超编。自赵万里《集释》成书之后,至80年代末,随着科学考古发掘的不断发展,魏晋南北朝墓志大量出土,远远超出《集释》所录。且因是书出版年代较早,发行数量不多,加上历经“文革”,存世有限,搜求不易。出于时代发展及学术研究的需要,赵超在《集释》及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墓志拓片的基础上,补充收集了1949年到1986年期间全国各地出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编成此书。《汇编》收录墓志近600方(其中东晋南朝墓志25方),均依据拓本及照片,以通行繁体字录写成文,并附列伪志(包括疑伪)目录。该书于各志简要介绍其形制(有无志盖,志石为椁名或石椁题字),并完整录写志石原文,对墓志资料作了系统全面的整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校勘不精,错、脱、倒、误之处不少。因此,近年来开始有学者从事该书的校理、勘误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毛远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校理》(《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下文简称《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罗新、叶炜著。90年代以后,又有不少魏晋南北朝墓志陆续出土,并公开发表,罗新、叶炜广泛搜集材料,著成此书。该书所收魏晋南北朝墓志,起三国之始(220年),迄杨隋之末(618年),均系《集释》、《汇编》二书所未见。其中,收录东晋南朝温峤墓志等19方。该书依据见载于学术期刊与石刻汇编类书籍中的相关墓志信息,参照拓片图版,采用标准简化字录写墓志文,附以“疏证”,介绍已有研究成果,并对墓志所涉史事作简单的考证和说明。《疏证》较之《集释》、《汇编》二书,于东晋南朝墓志研究有很大推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书于东晋南朝墓志仍有漏收者,且墓志录文对先前发掘简报虽有订正之处,然考辨甚少;所做“疏证”,相对浅显,综合传世文献的考察,尚嫌不够;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关注与引用,较为缺乏。如此种种,均有待完善。

(三)编目及索引类。在编集、刊布墓志资料的同时,为方便学者检索相关墓志出土及研究情况,部分学者曾编著过建国以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的目录,主要有2种:荣丽华《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王世民校订,中华书局,1993年),汪小烜《1990—1999新出汉魏南北朝墓志目录》(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两部著作,前后相继,体例一致,编目基本涵盖1949年至1999年各地出土且公开发表的墓志,兼及个别新发表的早年出土墓志。著录内容包括盖称、首题、卒葬年月、志石尺寸、志文字数、撰书人、出土情况、资料来源,并注明曾否发表拓片(照片)和录文,以及墓志刊布出处,极大便利了广大研究者检索。

此外,王壮弘、马成名效仿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体例,编成《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修订本),也有助于研究检索。

(四)单篇考证。针对考古发掘简报对相关墓志介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部分学者曾作相应探讨,主要是单篇墓志的考证、补释。相关研究论文有:罗宗真《梁肖敷墓志的有关问题》(《考古》1986年第1期),王素《陈黄法氍墓志校证》(《文物》1993年第11期),张敏《刘宋〈明昙慎墓志铭〉考略》(《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朱国平、王奇志《南京西善桥“辅国将军”墓志考》(《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王志高《温峤考略》(殷宪主编《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

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杨映琳《南京出土的东晋温峤墓评析》(《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上述考证论文对最初发掘简报中存在的问题,均进行了颇具针对性的深入辨证和梳理,这无疑使研究更进一层。然而,由于墓志本身的文体限制以及墓主个人经历的局限,单篇墓志中的史料往往显得零散、单薄,难以反映出历史事件发展的全貌,甚至不足以反映出其中的某个侧面。故而此类单篇墓志的考证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相对有限,多失之零碎而无法系统地应用于相关问题的考察。

(五)综合探讨。目前学界通论中国古代墓志的著作尚不多见,仅赵超所著《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等3部。其中,以《古代墓志通论》为晚出,是作者数十年来钻研墓志石刻的结晶之作。该书在综括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演变之后,详细介绍了有关墓志的研究情况与基本常识,概要论述了古代墓志的起源、发展、演变的总体情形,并探讨了墓志的文体、异体字等问题,是第一部相对完整论述古代墓志的研究专著。然而,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在第三章“南北朝时期的墓志概况”,著者立论大多是以北朝地域所出墓志为主,而东晋南朝墓志所占比重甚小,难见东晋南朝地域墓志全貌;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几乎完全以北朝地域墓志为基准,难免失之偏颇;对南北地域所出墓志对比考察不够,所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如“北方官员大量使用墓志,以及墓志形制的定型,应该都是受到南方的文化影响”(第67页),等等。

就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来看,含有整体考察内容的著作有6种: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七章第一节“墓志”),华人德《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13卷,北京荣宝斋,1995年,“魏晋南北朝墓志概论”),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五章“墓志与地券”),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第六章第一小节“墓志、买地券、文字砖”,由王志高、顾苏宁执笔),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七章第一节“墓志”),邵磊《冶山存稿》(凤凰出版社,2004年,“六朝墓志摭谈”)。首先,各书均就当时所见东晋南朝墓志作目录、列表,标明墓志年代、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墓主姓名、墓志质地、大小、资料来源及收藏单位,相关情况一目了然;其次,均不同程度地兼及墓志起源、形制演变、书法艺术,以及墓志所反映出的诸如土族联姻、侨州郡县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复次,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各书又自有创新与侧重,特点鲜明,并非简单地重复研究,或侧重墓志问题的综合考察,或侧重侨置问题,或侧重书法艺术,或侧重家族人口,或侧重书体书人,等等。但由于各书当时所见墓志资料不同(墓志数量多寡、刊布研究限制),立论依据也存在差异,导致了部分观点的出入。且6部著作墓志研究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都还谈不上是对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专题论著。

相对而言,通论性的论文则比较多,主要有:金琦《墓志史话》(南京博物院《文博通讯》总27期,1979年10月),徐自强《墓志浅论》(《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罗宗真《略论江苏地区出土六朝墓志》(《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罗宗真《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评述》(《文物》1981年第12期),王去非、赵超《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考古》1990年第10期),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藏六朝墓志》(《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华国荣《六朝墓葬中的墓志》(《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袁道俊《六朝墓志的若干特点》(《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人德《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初刊于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复刊于《书法研究》1997年第6期,后又相继收入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氏著《六朝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朱智武《东晋南朝墓志资料概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上述研究有纵观六朝墓志者,有单论东晋、梁代墓志者,对东晋南朝墓志的整体论述比较深入,勾勒了墓志发展的大致情形及其特点。然而,仔细研读之后,不难发现各文立论受当时所见墓志资料的限制,或着眼于某一地区而论,或仅就若干特点而谈,无论是对墓志地域特点的分析,还是墓志时代特征的探讨,所论均存在有待深入的地方。

不难看出,当前已有的研究论著,在对东晋南朝墓志做整体考察方面均付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缺憾也是存在的,研究尚有提升的空间。从研究者所在的地域来看,试图就东晋南朝墓志做整体考察,且研究取得很较大成就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南京地区。个中原因,也许与东晋南朝墓志大量出土的地域主要是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该地域墓志更受重视有关。从整体研究东晋南朝墓志的时段来看,通论性著作及论文,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墓志研究,广泛兴起还只是近10余年的事。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来看,主要是考古学者与书法研究者,前者研究多从考古学上进行思考,关注墓志与墓葬的关系,墓志的使用方式与墓葬等级等;后者则侧重从书法角度,对墓志的书法艺术、书体演变进行阐述。鉴于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有赖于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思维角度的变更以及学术发展趋势的把握。笔者以为,突破前人关于东晋南朝墓志的整体研究,至少有三个方向可以尝试:一,结合南京以外地区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做地域性考察;二,分析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及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特点,结合当前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做系统研究;三,从历史、考古、文学、书法、文字等各个层面入手,进行综合研究。

(六)专题研究。1. 墓志起源。讨论东晋南朝墓志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无法回避墓志起源问题。相关成果有:马衡《石刻》(《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赵超《墓志溯源》(《文史》总21辑,中华书局,1983年),汪庆正《南朝石刻文字概述》(《文物》1985年第3期),刘凤君《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中原文物》1988年第2期),熊基权《墓志起源新说》(《文物春秋》1994年第1期),郑建芳《最早的墓志——战国刻铭墓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9日),黄展岳《早期墓志的一些问题》(《文物》1995年第12期),冯时、金文馨《墓志起源刍议》(《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1日),吴炜《墓志铭起源初探》(《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程章灿《墓志起源考——兼对关于墓志起源诸种说法的考察》(氏著《石学论丛》,台湾大安出版社,1999年),李永明《中国古代墓志铭的源流》(《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年第1期),熊基权《魏晋以来墓志流变》(《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邱永君《墓志与墓志铭》(《寻根》2003年第6期)。以上诸家,从各自角度对墓志起源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主要形成7种观点:“周汉说”、“战国说”、“秦代说”、“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南朝说”。7种说法,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对此,朱智武《中国古代墓志起源新论——兼评诸种旧说》(《安徽史学》2008年第3

期)提出,墓志起源问题众说纷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学界对墓志定义的模糊,使得众人论说的角度不同(或就墓志形制论,或就墓志文体言,或从志墓观念谈,或从志墓形式说),所得结论自然各异,并认为先秦时期仅为志墓观念的积累,志墓形式相对较少,“志人”的意识还不强;至秦汉时期,志墓形式趋于多样化,志墓的观念与内容逐渐式微,墓志开始萌芽。

2. 墓志书法与书体。墓志书法艺术、书体演变研究,是学界研究东晋南朝墓志的重要方面,成果也最多,大致可归为两类。

(1) 排比所见墓志资料,通过观摩不同时期典型墓志的书法艺术,并将墓志同买地券、神道碑等其他石刻书法作比较,进而总结该时期墓志书法的总体特点、书体演变的特征及其艺术价值。主要有:庾人俊《关于晋朝的书体问题》(《书法研究》1982年第1期)、张果诤《〈爨龙颜碑〉的书法艺术、书者及其影响》(《书法研究》1983年第1期)、阮国林《从新出土墓志看南朝书法体势》(《书学论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王岗、肖云《六朝的书法美学思想》(《书学论集》)、卢海鸣《论六朝石刻的艺术成就》(《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罗宗真《魏晋南北朝突破性发展的书法碑志》(《东南文化》2000年第8期)、阮国林《从南京出土墓志看东晋、南朝书体之特点》、王志高《六朝墓志及买地券书法述略》、尹一梅《从建康出土的东晋墓志看书体的地方风格》、谢光辉《南碑述论》(均载《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刘守尧《百花齐放 争奇斗艳——由南京出土的碑石看六朝时期金陵书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李海荣《试论六朝铭文石刻的书体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 结合出土墓志书法的分析,探讨《兰亭序》真伪,进而揭示东晋墓志书法的艺术价值。主要有: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王元军《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丛文俊《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兼及“兰亭论辩”》(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涛《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兼谈神龙本〈兰亭〉》(《兰亭论集》)、朱智武《“兰亭论辨”与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综述》(加拿大《文化中国》2011年第1期)。

此外,尚有零星的单篇墓志书法研究,如虞卫毅《虚伧神素、脱然畦封——略论〈程虔墓志〉的书艺特征》(《书法赏评》1993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墓志书人身份提出质疑并进行重新认定。邵磊《南朝墓志书人身份辨析》(《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指出南朝墓志的书者多为身份较低的书吏,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名书家。朱智武《六朝墓志的撰者与书人身份辨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则指出,东晋墓志的撰者多为亲属;南朝墓志的撰者由亲属拓展至友人,其中皇室贵族的墓志甚至由著名文人担纲;六朝墓志的书人情况则较为复杂,应区别对待。

综上,学界从书法角度对东晋南朝墓志探讨较多,研究比较深入。不过,笔者认为有些问题还需要重新认定和深入讨论。例如,讨论东晋南朝书法,应注意以《兰亭序》为代表的尺牍书法与以墓志、买地券、墓铭砖为代表的铭刻类书法的差异,以及当时士人对墓志书法的参与程度;讨论东晋南朝出土墓志的书体,应注意到不同墓志的墓主身份与家族势力对书法的影响;通过墓志书法与尺牍书法的比较,分析士人书风与民间书法的差异,以及当时社会对书法

的关注程度与应用领域等历史背景的考察,等等。

3. 墓志文体。从文学、文献学角度,对东晋南朝墓志文体展开研究的学者很少,成果相对贫乏,笔者所见,仅程章灿有几篇论文《读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并论南朝墓志文体格——读〈文选〉札记》(赵福海等主编《〈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关于墓志文体的三个问题》(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墓志文体起源新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主要是从铭文体的演变来阐述南朝墓志文体的特点:墓志文体起源于传统铭文,由铭文演化而来;铭文位置不定,序铭分别不明,叙事详略不均。程文的研究特色在于传世文献的爬梳整理,通过整理六朝史籍与《艺文类聚》等类书所著录的南朝墓志,从墓志称名与录文内容上论述南朝墓志文体的形式及特点。但是对于东晋墓志文体并无涉及,且就南朝墓志文体言,程文也仅选择传世文献著录的典型墓志作分析,并没有将目前所见出土南朝墓志逐个分析、总体论述,整个南朝墓志文体的全貌仍难以窥见。

4. 墓志语言文字。学界对墓志词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墓志用词与字体这两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2部:罗维明《中古墓志词语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欧昌海、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前者以唐代墓志中出现的委婉语、用典词语为对象,对墓志中重复出现的特殊语词进行归类、诠释;后者放眼于石刻文献,不以墓志俗字为限,首先界定何为俗字,继而探讨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的类型、特点、产生的原因、源流及研究的意义。二书虽然部分涉及东晋南朝墓志的词语与俗字,但亦非专题论著。

墓志语言文字研究的相关论文有:宋英《碑志别体字浅析》(《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王小栋《六朝墓志中用典来表未成年的词语》(《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魏平《试论汉魏南北朝墓志的语言研究价值》(《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考察对象虽冠之以“六朝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但在实际研究中仍囿于汉魏北朝墓志,所涉东晋南朝墓志甚少。

5. 家族墓志及其他。士族门阀制度是六朝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因此,出土士家大族的家族墓志资料,往往受到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利用出土墓志资料研究士家大族的联姻、世系、门第兴衰等的成果主要有:白英《从出土文物看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制度》(《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罗宗真《从南朝出土墓志看南北士族关系》(《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罗宗真《从考古资料看六朝谢氏家族的兴衰》(《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王玉池《出土墓志对王、谢大族传世宗谱的补正》(《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总体来说,以上诸文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墓志专题研究,仍停留在利用墓志资料证史、补史、纠史的层面。

家族墓志的专题研究,参与学者不多,成果较少,仅见张学锋《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胡舜庆、姜林海《南京出土东晋王氏四方墓志书法评析》(《书法丛刊》2000年第4期)、王志高、胡舜庆《南京



出土东晋李氏家族墓志书法评析》(《书法丛刊》2000年第4期),朱智武《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5篇论文。张学锋以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家族墓志为考察对象,深入探讨了王、谢二大家族的世系、婚姻及政治得失等问题;胡舜庆、王志高等则主要围绕王氏、李氏家族墓志的书法展开评析;朱智武则通过对王氏家族墓志所记丰富历史地名的系统整理,深入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

其他相关墓志研究的论文尚有:贺云翱《南方六朝墓中出土文字杂识》(《东南文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王志高、邵磊《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志质疑——兼述六朝买地券》(《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刘涛《魏晋南北朝的禁碑与立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刘宗意《东晋王氏墓志之“白石”考》(《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2期),费伶伢《南朝女性墓志的考释与比较研究》(《东南文化》2005年第2期)。其中,费伶伢文突破近年墓志研究的俗套,将3方南朝女性墓志进行重新考释和仔细比较,从墓主出身、德行,墓志用韵、用典等方面展开论述,颇具新意。

台湾地区研究魏晋南北朝墓志者似乎很少,成果十分有限,仅见相关论文5篇:苏启明《魏晋南北朝书法小史》(台北《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期,2000年12月),沈国仪、陶冠群《高崧墓志与〈兰亭序〉》(《书友》总145期,1999年4月),卢建荣《墓志史料与日常生活史》(《古今论衡》第3期,1999年12月),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由华芳墓志铭观察》(《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7期,2003年11月),徐传武《〈左莱墓志〉及其价值》(《汉学研究》第13卷第2期,1995年12月)。其中,仅苏启明《魏晋南北朝书法小史》与沈国仪、陶冠群《高崧墓志与〈兰亭序〉》涉及东晋南朝墓志,且主要从书法角度立论,简略涉及《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辨析,然多沿用学界旧说。

### 三、国际学术界相关成果

国际学术界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以日本学者最为深入,相关论著颇丰,其研究方法 with 思路可资借鉴之处甚多。

涉及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相关著作有3部: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研究》(风间书房,1989年,第三篇补章“墓志铭よりみた南朝の婚姻关系”;第四篇第一章“南朝贵族の本贯と侨郡县”),中田勇次郎编《中国墓志精华》(中央公论社,1975年,“中国の墓志”)、《中田勇次郎著作集·心花室集》(二玄社,1984年,再次收入“中国の墓志”)。中村圭尔主要利用出土墓志资料,结合文献著录墓志,通过分析刘岱墓志、明昙愍墓志、谢涛墓志等有关家族联姻的记载,论述了六朝贵族的婚姻问题,并就南京出土王氏墓志、颜氏墓志、谢氏墓志、萧氏墓志,对南朝相关侨州郡县问题作了探讨(中村圭尔利用出土墓志对南朝相关侨州郡县问题的探讨,尚见《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中田勇次郎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墓志的发展状况,简要介绍汉魏至隋唐历代墓志,并着重分析了北朝墓志的文体与内容特征,并首次对墓志的撰者与书人问题提出质疑,可惜未曾深入。需要指出的是,中村圭尔与中田勇次郎立论所据,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土或公布的墓志资料,而90年代以后又有一批东晋南朝出土墓志公布。因此,有必要运用新资

料,重新审视中村圭尔及中田勇次郎的论断。另外,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在前揭赵超《汇编》与罗新、叶炜《疏证》所录墓志资料基础上,编成《魏晋南北朝墓志人名地名索引》(平成2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报告书,2008年9月)、《魏晋南北朝墓志官职名索引》(平成17年度—21年度文部科学省特定领域研究成果报告,2009年11月),相当精审,极具参考价值。

研究东晋南朝墓志的论文,笔者所见,主要有5篇:

(1) 中村圭尔《东晋南朝の碑・墓志について》(《昭和61・6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A)成果报告书》,“比较史の观点による史料学の综合研究”,1989年3月),从史料学出发,对东晋南朝的碑刻资料与墓志史料进行梳理,同时将出土墓志同《艺文类聚》所著录墓志文作比较,辨明《艺文类聚》仅就志文做节录,所录志文并不完整,且有混淆错讹之处,进而指出碑刻墓志资料的重要价值,并对墓碑与墓志的关系有所论及。

(2) 福原启郎《西晋の墓志の意义》(砺波护编《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虽非研究东晋南朝墓志的专文,然作者在梳理墓志起源问题的讨论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古代墓志起源于西晋时期;并将西晋墓志从形状、内容上进行分类,进而对各类别墓志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阐明西晋墓志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将墓志分类研究的方法与思路,对东晋南朝墓志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3) 佐藤利行、先坊幸子《“谢琬墓志”について》(《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35号,1999年1月)详细梳理、考补了谢琬墓志,并于谢氏世系、联姻家族有所论述。

(4) 川合安《六朝〈谢氏家族墓志〉について》(《古代文化》2002年第2号,总第54卷)对南京司家山出土4方谢氏墓志释文进行考释,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墓志内容做了疏证,探讨谢氏婚姻、仕宦、兴衰等问题。《东晋の墓志》(《平成14年度东北大学教育研究共同プロジェクト成果报告书》,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年3月)对琅琊王氏墓志、陈郡谢氏墓志及其他东晋墓志进行整理补释,将墓志内容与正史记载相比较,并考辨不同墓志内容格式,探讨了东晋墓志的史料特征。日本学者对墓志资料正确释读显示出对史料准确性的重视。然而川合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刘宋谢琬墓志来讨论东晋墓志的内容格式,自然不妥;将张镇墓志判定为“张镇夫人郭氏墓志”,显然有误,等等。

综观日本学界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比较注重整体论述墓志的发展概况、价值与意义,侧重史料的研究价值,以中村圭尔、中田勇次郎、福原启郎的相关论著为代表;90年代以后,更多注意对墓志内容的考补,重视墓志文字释读的准确性,颇类我国传统金石学的研究特色。其总体特点是研究细密,注重与文献的结合。

与日本学界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相对繁盛的局面相比,欧美学界则略显沉寂,对东晋南朝墓志关注甚少,相关研究成果鲜见,仅德国学者安然(Annette Kieser)《魂返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1篇,从墓葬形制和墓志两方面考察了东晋贵族对死后的归属,是魂归故土还是寄托异乡的两种心理状态。

#### 四、分析与结论

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已有的研究成果,无疑为东晋南朝墓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然而,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及已有成果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仍相对比较薄弱,前人研究中有待深入的地方还不少。总的说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明确以东晋南朝墓志为专题研究对象,综合传世文献所著录的东晋南朝墓志与新出土的墓志材料,突破学界此前仅就新出土墓志材料立论的做法,对东晋南朝墓志作整体考察。

第二,从墓志的形制、内容、文体、书体、文字等各个角度,全面而系统论述东晋南朝墓志的特点、价值及意义。

第三,重新检索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传统金石学的已有成果,结合新出土墓志材料,对相关问题作更全面的论述。

第四,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对墓志、墓葬问题作更深层的探讨,挖掘墓志记载中所隐含的社会内涵。

另外,从不同专业出身的研究者来看,他们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例如,研究历史、文学、书法的学者不一定通晓考古学,从事考古工作的研究者则对历史、文学、书法往往有所忽略,因而在各自的研究中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错误,留下某种缺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晋南朝墓志的系统全面研究,离不开相关学科知识的注入与辅助。当然,在学术分科日趋细密的今天,这种综合性的研究由某单个人来实现,难度不小。

本文是在2009年江苏南京“建国六十年来六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所提交论文《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础上再作增补、完善而成的,论文修改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小尾孝夫先生的诸多帮助,谨致谢忱。

## 清代新疆自然灾害研究综述

阿利亚·艾尼瓦尔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3)

清代新疆灾害史研究比内地其他省市区起步较晚,关注此问题的人也较少,至今也没有一部专著。目前与清代新疆灾害史有关论著有刘星的《新疆灾害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疆减灾四十年》(地震出版社,1993年)、《新疆自然灾害研究》(地震出版社,1994年),后二种仅是研究新疆解放后的各类灾害及其灾害规律问题。除此之外有袁林的《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该书虽包含新疆等西北五省,但对新疆的灾害资料收录很少,甚至没有纳入研究范围。除上述研究成果之外,尚有《新疆气象史料汇编》、《新疆地震资料汇编》等。现将对上述论著以及新疆各类灾害汇编资料和相关论著、论文作较细致的评述,以便我们对清代新疆灾害史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希望能对今后清代新疆灾害史研究有所帮助。